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美國總統選舉將於2024年11月5日舉行，無論最終鹿死誰手，選舉結果勢將對未來四年的美國政局，以至全球政經格局帶來相當的影響，尤其是中美關係。本刊計劃在今年12月號和明年2月號刊出專輯，邀請專家學者撰文為我們提供深入的剖析，敬請讀者留意。

——編者

民族問題的錯綜複雜

王娟〈少數民族高考優惠政策的認知與爭論〉（《二十一世紀》2024年4月號）一文大致釐清了中國高考中少數民族加分政策的來龍去脈，從中梳理出了不少令人玩味的細節。少數民族高考加分不僅是一種類似平權行動（affirmative action）的糾正不平等的補償政策，還是一種對少數民族在中國現行體制下政治地位、權力的體現，而後者卻很少被人意識到。客觀地說，這種為世居於此、但最終未能成為民族國家政治建構主導力量的少數群體賦權的「權利觀」，是維繫多民族國家所必須的，無此便談不上國家的統一與穩定，其重要性遠高於單純為弱勢群體作出

的補償。遺憾的是，從高考加分這個角度來看，不管是政府還是公眾都對其缺乏認識，這對中國民族政治的未來發展會產生甚麼影響？

用王文的框架對照我家鄉新疆的高考少數民族加分政策，可以有更多的新發現。2015年及以前，維吾爾、哈薩克、蒙古、柯爾克孜、塔吉克、錫伯、烏孜別克、塔塔爾、達斡爾、藏、俄羅斯十一個民族的考生如果同漢族考生一起參加漢語言高考（俗稱「民考漢」），按父母雙方或一方為以上十一個民族計算，分別加50分或10分錄取；回族考生加10分。非以上民族考生參加民族語言高考（維吾爾語、哈薩克語、蒙語、柯爾克孜語四種語言，俗稱「漢考民」）標準相同。可以看出，新疆高考少數民族加分的首要對象是用非母語參加高考的考生，屬於王文中未有提到的一種「正向鼓勵型」加分，即鼓勵各民族文化交流交融，特別是少數民族接受漢化教育；其次也包括王文中提到的，因民族自治地方的設立而需考慮的「權利觀」加分；最後還有針對藏族、俄羅斯族的加分，恐難以用王文中的任何一種框架解釋（新疆藏族甚少，而擁有

中國最多的俄羅斯族）。這一政策雖後來在分值上有所調整，但一直延續至今。

自2016年起，根據教育部的要求，南疆四地州（和田地區、喀什地區、克孜勒蘇柯爾克孜族自治州、阿克蘇地區）開始對所有考生進行加分，則是在加分政策中又加入了「補償觀」的考慮。新疆的高考少數民族加分政策同時具備「正向鼓勵觀」、「權利觀」、「補償觀」三個維度，在近年來又多次調整，這一政策作為一面鏡子，或許能反映出新疆民族問題的錯綜複雜。

周以諾 烏魯木齊
2024.5.11

中國與資本主義體系的關係

姚昱和李海媚的〈冷戰優先還是貿易優先？——1958年中國對東南亞出口躍進政策探析〉（《二十一世紀》2024年6月號）向我們展現了冷戰時期中國經濟與對外關係的另一面相：中國在其深度融入國際社會主義經濟體系的時代，也在探索形塑自身同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之關係的策略與路徑。從這個意義來說，1958年初至1959年初中國確立並推行對東南亞出口躍進政策，正是其在特定地區所進行的早期嘗試，儘管其結果是苦澀的。

在短短一年左右的時間內，中國對東南亞的外貿政策驟然急進，最終又在引起國際輿論關注和東南亞諸國恐慌及

反彈之後，迅即選擇自我克制。對此，學界主要有「經濟學解釋」、「政治外交因素影響的『經濟冷戰』解釋」、「政治經濟學解釋」和「大躍進事件史」四種解釋。姚昱、李海媚在汲取前人研究、充分運用中外文獻的基礎上，系統綜合全球冷戰史、中國政府「經濟治國方略」和國內政治過程這三種視角，提出了新解釋。

要言之，其一，1958年中國對東南亞出口躍進政策的形成是國內外多方因素疊加的結果，包括中國政府意圖同西方陣營爭奪東南亞市場、國內大躍進激進主義蔓延、中央部門內部及其同地方政府之間競爭加劇、中國經濟對外國資金技術的需求擴大等內部因素，以及中國同兄弟國家的貿易矛盾頻發、西方對華貿易管制政策放鬆等外部因素。其二，該政策一經確定即得到有力推行，得益於中國體制賦予中國政府強大的動員、組織與統籌調度能力。其三，由於遭到東南亞各國的強烈反彈，又受制於大躍進造成的自身經濟困難、中央對大躍進激進政策的調整、中蘇經濟矛盾激化，再加上爭取印度而力避彼此經濟競爭發酵，1959年初中國政府主動扭轉了對東南亞出口躍進政策。在諸多影響中國政策抉擇的因素中，在經濟上盡可能多地出口創匯和在政治上必須服從中國對外政治鬥爭需要，是其兩大基本考慮。恰恰是這兩者之間存在難以彌合且不斷激化的矛盾，致使中國對東南亞出口政策出現從「躍進」到「主動收縮」之劇變。

作者於文末提出了一個發人深思的問題：紅色中國在經濟領域始終面臨着一個根本挑戰，即究竟應與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建立何種關係？自新中國成立至今，歷代決策集團在處理同資本主義體系的關係時，一直受到「意識形態競爭、制度競爭」和「追求經濟利益」孰輕孰重、孰先孰後這個關鍵問題的困擾，從未完全解決。而北京的每一次戰略抉擇、政策變動，無論是對當時及之後相當時期內的國計民生，還是對相關區域乃至整個世界，都有着深刻影響。當前世界又一次進入大國戰略競爭時代，中國在思考自身同資本主義體系的關係、制定相應經濟戰略與政策的時候，實有必要冷靜應對。

蔡梓 上海
2024.6.30

宏觀視野下的印支革命史

在國際冷戰的背景下，老撾局勢的發展已經遠遠超越了一國的界限，而是與大國在東南亞的競爭、越南局勢和印度支那革命等問題緊密相連。對冷戰時期老撾問題的探索，也應打破「國別史」或雙邊關係的藩籬，立足於更為宏觀的視角展開研究。游覽的新作〈論中越在支援老撾革命問題上的合作與疏離(1960-1965)〉(《二十一世紀》2024年6月號)便從國際共運史的宏觀視域出發，綜合運用中、越、美等國文獻資料，客觀地還原了中越兩國在老撾問題上的分合歷程。

冷戰時期的老撾局勢發展線索複雜，超級大國和周邊國家紛紛介入老撾危機，不僅對

立陣營間針鋒相對，即便陣營內部也存在較大分歧。在西方陣營當中，美國與盟友英國、法國、泰國，以及老撾的「代理人」富米·馮維希(Phumi Vongvichit)集團之間頻繁發生激烈衝突；在社會主義陣營內部，中國、蘇聯、北越在處理老撾問題過程中既展開了積極合作，也存在明顯的分歧。相較蘇聯以犧牲印支盟友利益換取同西方妥協的政策，中共的「革命路線」顯然更符合巴特寮奪取老撾政權的目標，也契合越南勞動黨解放南方事業的需要，這導致中越在支持巴特寮的進程中結成了「統一戰線」，蘇聯在印支共運中的話語權一度衰微。然而隨着中越合作的深入，兩黨的矛盾也逐漸凸顯。在越寮「特殊關係」的作用下，寮方愈發依附於越南黨，而疏遠與中國的關係，中國對老撾黨的影響力逐漸被邊緣化。

中、蘇、越對寮政策深受社會主義陣營內部關係變化調整的影響，需要以宏觀視角來審視具體事件。到1960年代初，隨着中蘇分裂的加劇，雙方的「路線鬥爭」也影響到印支地區。中越在援寮問題上的協作同中蘇理念分歧與雙邊關係嬗變有着直接關係。而1965年後中越在援寮問題上的疏離，也是蘇聯重新重視印支革命的客觀結果。在既往研究中，鮮有人深入探究中、蘇、越關係變遷如何影響老撾局勢發展。游覽通過考察中越在老撾革命問題上的共同訴求和內在分歧，揭示了中蘇關係及蘇聯印支政策變動對中越合作援寮造成的衝擊，有效填補了冷戰問題研究當中的一個「盲区」。

吳林章 石家莊
2024.7.1